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结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刊发。这份《决定》的震撼力度大大超出预期。这份《决定》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次标题中不再单独而集中地体现经济改革,而是体现方方面面全方位深化改革,但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局改革中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正如《决定》所言,“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更为重要的是,《决定》要求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的最强音。

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显著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是农村的放开搞活,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重了市场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和力度。十七大对市场基础性作用加了修饰词“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十八大为进一步加重市场作用的砝码,又加上了

市场化改革的最强音

沈桂龙

“更大程度更广范围”。但所有上述表达都没有脱离“基础性作用”的范畴,而这一次用“决定性作用”来取代,且将政府作用的发挥置于其后,这不仅仅是文字的改变和顺序的颠倒,其背后反映的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市场化深度和广度,说明改革将会有不同以往的质的飞跃。

市场化改革的深度裂变体现出改革的勇气与智慧。回望每一次重大改革,不能忘记改革者表现出的政治勇气,甚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每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变动,都蕴含着改革智慧所捕捉的有利时机和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因此,十年乃至二十年取得的重大改革进展来之不易,付出的成本也令人印象深刻。在自然而然接受某一个标志性的名词和认识时,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少人也在固化这种认识,并在惯性改革中囿于改革认识。昨天的改革支持者也可能成为今天改革的阻滞者,从而需要新一轮政治勇气的碰撞与改革智慧的开窍。因此,自1992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来,这次提出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二十多年改革深化的一次重大裂变,需要倍加珍惜和维护。

市场化改革能否深度突

破,很大程度上要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否真正取得进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对关系处理最关键的在于政府自身的转型,而政府能否成功转型最好的观察点就在于行政审批制度是否真正取得成功。行政审批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最常见制度,也是市场主体触碰最多、受影响最为直接的制度。但几十年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行政审批事项的调整、精简和下放,如同割韭菜一般反复拉锯,充分说明市场与政府天平的动荡不稳。因此,《决定》要求“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

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十八大以来,新一届政府已经三次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改革,但要加重市场的砝码,还需要进一步在行政审批改革中减轻政府的分量。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需要用具体领域的单兵突进,来找到改革的突破,并在巩固基础上不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目前承担着市场化改革的抓手作用。但现在已“甩开膀子”,而不是“喊破嗓子”,这就是改革的信心所在……(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又一只“麻雀”

凌河



近日官场之上,又飞出一只“麻雀”,一条“一套房换一个副厅级”的奇闻,引出了网上报端沸反盈天——广东省茂名市市长助理雷挺,在市建设局局长任上,为了要企及“一步之遥”的“副厅级”,花了511577元,买了一套房,送给了市委书记罗荫国。雷挺果然当上了时任市长的罗荫国的“助理”,果然戴上了“副厅级”的乌纱。

说这是一只“麻雀”,是说它其实并非“奇闻”,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且天下鸟儿,大同小异,具有它的某些“普遍性”——雷局长为什么要送房子,因为要升官,升官为什么要送房子,因为罗荫国是“一把手”,乌纱帽掌握在他的手里,升不升,全凭他“一张嘴”,提不提,在于他“一支笔”。不是说干部要组织部门考察、推荐吗,不是说提任要“一班子”民主决策吗,可惜得很,在不少的地方,恐怕只是一种“摆设”,真正拍板的,还在于“一把手”,所以雷挺认准了这个道理,要给“一把手”送房。

也许孤证不明,一只“麻雀”还不能“俱全”,那么再看一下几个月前判决的两起案子吧——甘肃省华亭县县委书记任增禄,受贿991万,另有411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而长长的起诉书,竟有华亭县129名官员向任书记行贿,几乎覆盖了县委、县政府和各乡镇机关;安徽省萧县县委书记毋保良,受贿109起,共2000余万,也是长长的起诉书,涉及66名萧县官员向他行贿,又覆盖了该县所有乡镇和县直机关,竟还包括县四套班子的成员。官员为什么集体行贿?因为“其中七成与调动升迁有

年轻人的话语霸权

徐达内



在全国假日办公布三套法定节假日调休安排方案并公开征求意见之前,曾经有过一个据称来自中国政府的“2014年放假安排时间表”流传一时。我自己是从看到的第一眼起,就没相信过。“元旦节放5天,春节放9天,元宵节放2天,劳动节放5天,国庆节放9天”,加起来一个月,这怎么可能,天天说“要向公权力重申常识”,真碰上这种稍微用脑子想想就知道不可能的事,“常识”就被扔到爪哇国去了,“常识”就成了选择性的“常识”。

官方辟谣之后,看到些辩解的文章,《假“放假表”凸显真民意》云云,是很不以为然的,北京青年报那篇《别拿“真民意”为假新闻涂脂抹粉》说得好:“表面上看,老百姓似乎希望放假时间越多越好,但是,真正的‘民意’不是盲目的、情绪化的、异想天开的,而是理性的、务实的、讲道理的,有着充分的利弊权衡。”

互联网确实是民意得以呈现的史上最畅通渠道,但民意和民粹之间也只是一线之隔。且不说“放假表”这种明显有“恶搞”成分的产物,单单从网络话语权主要是掌握在玩世不恭的年轻人手里这个现实分布来说,靠在微博论坛上走马观花一番,采集些依靠嗓门大而惊动四方的声音,就是非常偏颇的民意感知方式。中秋节前五仁月饼被“黑”成那个样子,最后商场里卖得最好的却恰恰就是五仁月饼,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讲到这个网络话语权的分布,还想起另一件事,就是最近谈论得很热闹的“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这个讲法其实也是流传已久。是凤凰网根据几则新闻出了个首页专题《中国老

当低头族与闹钟匮乏族并存

李泓冰



一个叫兴语的七岁男孩,凌晨在云南通海县纳古镇街头徘徊,被好心人报警。一问之下,孩子的妈妈早就离家出走,那天打工的爸爸加班,独自在家的心担心上学迟到,不敢睡觉,打算连夜走到三四公里以外的学校,等到学校一早开门……民警送他回家,拍了一张家里的照片:家徒四壁,满目凄惶,看上去唯一体面的,是兴语胸前那条和他瘦小的身躯相比显得过大的红领巾。

这个辛酸的故事,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好心的民警次日送了一个小闹钟,兴语开心得哭了:我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然而,兴语的人生故事,兴语们的故事,显然不会因为这个小闹钟而逆转。

对大多数读故事的国人来说,这个故事的情境,悲凉得太过遥远,这遥远不只是地理距离,还有时代跨度。几天前,和一位我尊敬的长者谈及他喜欢的微博,我开玩笑说,微博么,已经是传统媒体了吧,不是说影响力衰竭了三四成了,如今是微信天下。他惊讶地说,那新闻网站呢?我知道,长者还是常从门户网站刷新闻,我说那算古典媒体;他不服气再问,纸媒呢?我大笑了:那简直就是远古媒体了……

玩笑归玩笑,但这个时代的传播生态,在技术的引领下,就是这样一日千里,稍不留神,就被新的传播方式扔到“古代”去了。悠悠万事,一部小小的手机全部搞定,有人用“低头族”形容这一代人,不管是饭桌上还是地铁里,我们永远在低头注视手中那个花样百出的终端,须臾不可离身;世界就这么尽在掌握。

当兴语的故事从手掌里跳出来,夹杂在铺天盖地对

王力宏和李云迪的哥大女友们的吐槽中,显得那么突兀,那么不合时宜。这个小小的孩子,是穿越了么?从信息时代直接穿回农耕时代?否则,当闹钟已经弱化成手机的无数功能之一而被弃若敝屣之际,还有孩子会为了古典的小闹钟哭泣?

这就是中国。它是在起飞,飞到了崭新的美好时代。只是我们飞得太快,不经意间把一些人丢下了,丢在另一个荒凉的远古,如小兴语般在昏暗中踽踽而行。光棍节抢购、土豪金风行,奥数班的开开停停、明星们的分分合合,这种种小时代的热闹,对兴语来说,是一些陌生的童话泡沫。

就这样撕裂着:有神九上天、蛟龙入海,也有山区孩子失学挨饿,有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失了父母怀抱。眼下,最要紧的事,就是弥合这个深深的裂痕。否则,如此好学向上的小兴语,长大后骤然面对花花世界和悬殊的贫富差距,保不齐就会心理失衡,甚至成为云南大学的马加爵或是复旦大学的林森浩。

没有小兴语们的参与,民族的复兴,哪怕被专家算到了90%,也还是一个童话。

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这两天在山东说的话,便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改革开放使我国以世所罕见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但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难题,不深化改革不行,深化改革力度小了也不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资源配置方面改革力度很大,招招剑指悬殊的贫富差距。而在拥有玉溪名烟的通海县,小兴语们希望的是,全面改革为他们带来的,将不仅是卷烟的香味儿,也不仅是好心人送的小闹钟,还会和低头族们一样,有妈妈爸爸陪在身边,有一间温暖的房屋,有近处的学校可以读书……